

乡村社会关键词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

贺雪峰 著

Keywords of Rural Society

A Sketch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山东人民出版社

乡村社会关键词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

贺雪峰 著

Keywords of Rural Society

A Sketch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 / 贺雪峰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209-05467-6

I. ①乡… II. ①贺… III. ①农村—社会调查—中国文集 IV. ①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4332 号

责任编辑：王海玲

装帧设计：蔡立国

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

贺雪峰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5mm×235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467-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农村的巨变几乎同时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2001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千年皇粮国税取消，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农民的流动尤其是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使封闭村庄的边界大开，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结构力量快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宗族、小亲族等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超家庭单位的瓦解，也包括家庭结构本身的变化；三是农民价值系统或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农民以传宗接代作为意义本源的价值系统受到现代性的全方位冲击，且已与落后、封建、愚昧等负面词汇画上等号，农民意义世界中的历史感被当下的现世利益所取代。一旦农民意义系统发生变化，构成中国农民数千年行为的基础即被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诸多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变。

中国农村以上三种变化同时在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出现，既是一种巧合，又有一定必然性。之所以可以取消农业税，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现代化是西方发源而自外而内影响中国社会的，中国被迫进行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现代性不断侵蚀中国传统的体制、文化和社会的过程。现代性的侵蚀一旦到了某个阶段，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结构与传统价值自然发生改变。首先是国家强力改造了传统结构的外观，比如宗族财产被没收，宗族活

动被限制，传统宗教被宣布为封建迷信。接着是现代性的逻辑渗透到社会内部以及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了个人的意义、目标和行为逻辑，从而也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面貌。

因此，一个半世纪以前入侵的西方现代性，到了 20 世纪末就同时在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基本社会结构和农民价值与意义系统三个层面开花结果。

二

也是在 20 世纪末，大致是 199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这一年，我正式进入到农村研究。1998 年开始，持续 10 多年，我每年用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全国不同的农村地区调研。刚开始到农村调研，既无时间的概念，也无空间的概念。在我眼里，农村是既十分熟悉，又相当陌生。熟悉是因为我生长在农村（湖北荆门农村），对农村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极其熟悉，以至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这是一种生活中的熟悉，是一种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熟悉，是不问为什么的熟悉，而不是学术上的熟悉。等到了家乡以外的农村调研，发现家乡的理所当然，到了外地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逻辑，以前一切都是合理的必然的事情，现在则变得不确定起来。在外地农村调查越多，对家乡农村就越是不熟悉，越是陌生起来。

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下面，我将自己在全国不同地区调查的感想记录下来，并在 2003 年汇编在一起，以《新乡土中国》为名出版了。《新乡土中国》是我对中国农村首次的学术观察，这个观察可以说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是一种静态的观察。正如我在《新乡土中国》后记中所写，之所以将这些观察取名《新乡土中国》，是想沾费孝通先生的光。但也许我现在明白了，我将这些观察取名《新乡土中国》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 20 世纪末创造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恰恰是因为乡村社会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将之概括为“九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储水池”。而且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农村在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的基础作用，就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 20 世纪末的所谓中国奇迹。本书第

一篇的文字也许可以帮助我来回应为什么将 20 世纪末的中国仍然称为乡土中国——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的原因吧！

出版《新乡土中国》以后，我开始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巨型社会的区域差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恰恰缺少区域的视角，而是将庞大复杂的中国农村当做了—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理想型。这种理想型显然远离中国的现实，既无时间概念，又无空间概念。说《乡土中国》无空间概念好理解，因为费孝通并未区分中国不同地域的差异。说缺少时间概念，则似乎不妥。问题恰是，费孝通所描写传统中国被作为—了一个整体，而其实这个传统中国有 5000 年的文明，至少有 3000 年的明确历史记载和 2000 年的皇权统治。而费孝通先生所观察到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变迁，却大多还只是千年巨变的开始，这个巨变是到了 20 世纪末才变得明显起来的。

我在 2003 年至 2007 年的数年调研思考，最终以《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和《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两部书稿的出版而告一段落。这两部书稿，一部是调查报告，一部是理论建构，试图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看问题的视角，而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差异的观察方法或区域的视角。有了区域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中国农村发生的一切，就会变得极其丰富、生动和有趣。在区域视角下面，我们可以更为细致也更为真实地讨论中国农村和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可以建立起更加切近实践的中层概念和中观理论。这几年，我及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村治学者应该都已经习惯使用区域视角这把锐利的工具，来更加深入细致地解剖中国农村和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农村研究概念体系。

2007 年以来，我继续在农村行走。这一年我也主持了一项大型农村调查，这些调查的成果于 2009 年 1 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以《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为名出版，一套 16 种。在丛书总序中，我概括了当前中国农村的三大巨变，并为总序取名《巨变的图景》，希望通过不同地域都在发生巨变的记录，来说明中国当下农村的轨迹。我也自 2007 年开始，有意识地在每次田野调查之后，将调查感想以随笔形式记录下来。逐年累积，到了 2009 年，已经写下 70 多篇 30 多万字的调查随笔。正是这段时间的田野工作和随笔撰写，使我恍然感到了农村不同区域都在共同迈向告别传统中国的巨变的伟大历

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变局，使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在2009年7月，我将2007年至2009年的调查随笔以《巨变的图景》为名汇编在一起，编印出来作为同学们的调研参考资料。在2010年1月的一次调查途中，我突然想到，这些年的调查随笔可以结集出版，从而可能正好反映出进入21世纪之初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这场巨变的某些片段。

至此，经过10年多一点时间，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终于由一个既无时间又无空间的农村，进入到一个有了明确时空定位的中国农村。将一个笼统抽象的农村分解为若干生动具体的农村，再回到一个包含了具体的抽象农村。只有这个包含了具体的抽象，才能包容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也才真实，也才能为理解中国的政策实践和社会变迁提供有力依据。

三

2008年7月以《巨变的图景》为名来编辑这几年所写调查随笔时，是以调查时间和地点为顺序编排的。每在一个地方做调查，都会形成一些观感和想法，因此会集中写若干篇随笔。2007年以来，我主要的调查点有辽宁沈阳、河南汝南、四川绵竹、湖北英山、湖北建始、湖北京山、贵州湄潭、湖北大冶、浙江奉化、江西赣州、湖北沙洋等农村，均是吃住在农户家中。遗憾的是，有些农村调研之后，因为杂务繁多，未能及时成文。一段时间之后再想写作，却因为没有了现场感而竟写不出来。这些年写出来的70多篇，加上2004年在陕西关中农村调查所写几篇随笔，一共选出45篇，分为七部分，分别按经济、社会的排序，编辑成目录上的样子出版。

因为调查随笔所写内容细碎零乱，我有意将书名改为《乡村社会关键词》，意思是，凡是关心农村某个方面问题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的目录中找自己关心的问题，从而可以直接查阅到这些问题在本书的描述。我相信，这些具有强烈经验情绪的描述，可以深化我们对至今仍有9亿农民依托其生活的乡村社会的理解。

四

我和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的村治学者一直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经过长期努力，撰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农村社会学》，建构一套可以让中国大众和政策官员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社会科学本土化本身并非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主体性，让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具有主体性。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服务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而，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福祉增进的事业。

2010年6月18日下午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农民收入与消费 1

农民收入的构成 1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5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21

农民的投资行为 27

农民消费与打工经济 33

新城市剥削农村 38

土地与最基础的人权 42

理解农作 46

“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50

第二章 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57

农村的经济分化 57

村庄的经济社会分层 61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 66

农村社会的竞争机制 70

经济分化与妇女地位 75

第三章 婚姻与家庭	80
农民的婚姻与家庭	80
彩礼、嫁妆与家庭责任	88
分家与农村家庭结构	92
“操心”与农村代际关系	98
代际关系的平衡性	102
生活化的家庭观	106
从“耙耳朵”说起	110
第四章 价值与信仰	116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其变迁	116
农民生育观念的变迁	125
婚丧礼仪逻辑之变	130
农村老人为何自杀	135
地下基督教与农民信仰	143
家庭理性化的后果	150
第五章 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	155
公与私	155
大私与小公：特殊主义逻辑的锻造及运行	159
村庄里的公共性问题	169
酒席的性质	177
闲话与公共空间	181
公私观念的区域差异	186
第六章 农民行动单位	190
关中农村的户族	190
川西平原的院子	194

作为行动单位的村民组	197
房头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202
农村社区建设与传统资源	216

第七章 理性与理性化 229

农村社会的半熟人化	229
乡土逻辑与熟人社会	236
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	240
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	244
农民理性化的进程	254
熟人社会的治理	263

附 录 274

关于“田野的灵感”	274
-----------	-----

后 记 281

第一章

农民收入与消费

农民收入的构成

离开务工收入，而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同样，若没有农业收入，而仅仅有务工收入，农民就不得不用务工收入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压缩各种社会性支出，就不再有能力购买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奢侈品，就有可能落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底层。

近年在农村调查，强烈感受到农民对现状的满意。有老人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可惜人已经老了，不能享受更多时间。因为机械化和轻简便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开始告别肩挑人扛的时代，重体力劳动大为减少，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有充裕的农闲休息时间。应该说，中国95%农村的农民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富足时代。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农民也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而不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农民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不得不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不得不购买超出温饱的各种奢侈品，不得不支付现金来获取各种服务，如医疗、教育乃至农业技术。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是，当前的中国农民面对着极为强大的支出压力。农民总体状况是温饱有余，但还达不到小康，

可以归结为“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加深、农民现金支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增多，以至到了2000年以后，农村已经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大都外出到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去了。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能真正在城市生活下来。进城务工的绝大多数农民难以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进城农民工必须依托农村的家庭收入，来维持一个生活在农村还不差的生活水准。他们在城市的务工收入也只是在农村花费才能算得上不错的收入。

也就是说，自90年代以来，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收入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工，一部分收入来自务农。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的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相差不多。对农民来说，仅仅依靠务农收入，或仅仅依靠务工收入，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消费主义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都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我们可以将农民外出务工看做农民越来越不能依赖务农收入而不得不进行的外出兼业行为。也可以反过来，将进城务工农民保留农业收入的务农行为称为兼业行为。正是依靠兼业的务工务农，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仅维持了收入的增长，而且有能力应对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保持住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更具体地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及可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收入状况，是与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也就是与农民的家庭结构有关的。在农村，一般的家庭结构是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中间是一对中青年夫妻。子女未成年，是纯粹的消费者，不仅不能为家庭创造收入，而且往往是家庭主要的消费者，尤其是教育支出构成了农民家庭支出的最大笔的、长期的常规支出（由幼儿园到大学：若可以考上大学的话）。中青年的夫妻当然是家中赚取收入的主力，但仅仅依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以应对家庭支出，难以维持一个起码的体面生活。因此，年轻人外出务工成为当前农民的首要选择。

一个农村家庭除了未成年子女和正当壮年的夫妻外，一般还有尚能劳作的父母。农村老年人在70岁以前一般都会参加农业劳动。在当前机械化作业

越来越普及、轻简便劳动技术广泛推广的背景下，作为父母的60岁上下的下一代人，基本上可以较为轻松地完成户均不过十亩土地的耕作，还可以养鸡喂猪，种植蔬菜。或者说，因为年龄较大而缺乏进城务工优势的作为父母一代的中老年人，可以通过从事农业种植来获取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却是家庭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老年父母不仅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在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农业生产不再纯粹是繁重体力劳动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并非多么艰巨的任务，适度参加农业劳动，对中老年农民，不仅具有身体上的意义（活动），而且具有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劳动作为一种内在需要，让参加劳动的农民获得了生命的价值）。

这样，农民家庭要维持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在消费主义压力下保持住体面的生活，就可能通过将务工或务农作为兼业，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只有务工收入或务农收入，这个家庭将难以应对支出压力的增长，从而陷入贫困状态，能够维持温饱就不错了。而若有或是外出务工（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情况下），或是在家务农（务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的情况下）的收入作为补充，则这个家庭就不仅可以维持温饱，而且会有些闲钱，可以在农村生活的安逸惬意——至少从经济上可以这样看。

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家庭是通过农业收入来解决温饱，而通过外出务工获取现金收入。虽然外出务工的现金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这些收入拿到农村却是一笔大钱。因为土地收入可以应对家庭日常的生活支出，务工收入就成为家庭的闲钱，就可以应对各种社会性交往（如人情），应对消费主义压力，及购买表现自己地位的奢侈品。离开务工收入，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农民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同样，若没有农业收入，仅仅有务工收入，农民就不得不用打工收入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压缩各种社会性支出，就不再有能力购买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奢侈品，就有可能落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底层。当然，这些家庭就更加没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均分的农村土地，使得所有尚不具备真正进入城市安居条件的农民，可以在农村拥有户均数亩的土地。依靠年龄偏大的父母的耕作，这些土地为农民家庭提供了也许不多却至关重要的

收入，正是这些务农收入，使农民家庭不需要用外出务工收入来购买农村生活必需品，使农民家庭可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可以生活得体面而且有些尊严。

倘若不再有来自户均数亩土地上的收入，农民家庭即使仍在农村生活，其生活水平与质量都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十分热衷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希望通过加快土地流转来形成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有人规模经营，必然有更多农户无地经营。无地经营即无来自农业的收入，没有来自农业的收入，农户生活质量就必然会下降。几亿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将不是一件仅仅事关农业的小事，而几乎必然地成为政治性的大事。

2008年10月16日上午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这种务工，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费用。这种外出务工，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这种务工，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费用，这种外出务工，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不仅会对乡村治理造成影响，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逻辑指导下的农民生活质量。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向第二种逻辑过渡，这种过渡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策人为加快农民务工逻辑的这种过渡，可能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1.6亿左右。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因为大量劳动力进城，农业领域过剩劳动力大大减少，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比如第五次

人口普查也将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半年的农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进城农民工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进城农民工往往要依托在农村的土地来养活家人，上养父母，下育子女。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城市赚钱，而在农村实现人生目标。这样一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就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带来资源的输入，农民工不断地从城市务工获取收入，以此滋养农村的家庭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仅仅依靠农业，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70年代沿海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兴办乡镇企业的高潮，大量农民转移进入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有了提高。

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较快的发展及就业上的离土不离乡，首先拉开了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农村农民收入的差距。到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具有极强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和城市转移。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潮。

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从农业中已难以获取较高的劳动回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区，农民越是有着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因为在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面，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对于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

从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有些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在离土又离乡的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不少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20年一代人，到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开始退回农村，他们的子女一代接